

· 青年：探索与争鸣 ·

梅尔文·莱弗勒的美国国家 安全观研究

丁何昕子

【摘 要】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战后美国外交史、冷战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不同理解，不同学术流派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各有偏重，但对外交、防务、经济等要素之间的关联少有研究讨论，因此也缺乏基于多维度视角的整合性研究。梅尔文·莱弗勒自投身冷战史研究之初，便致力于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搭建桥梁、调和矛盾。在吸收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学术成果、强调国家安全感知属性的基础上，莱弗勒最终形成了将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综合为统一整体的研究方法，用以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逻辑。因此，无论是将他作为后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是作为冷战文化史研究的推动者，莱弗勒的美国国家安全观研究在冷战史研究中都值得重新审视。

【关键词】梅尔文·莱弗勒 美国国家安全观 美国外交史 冷战史

【作者简介】丁何昕子，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6-0143-16

美国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是战后美国外交史、冷战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① 冷战史学者通常认为，这一概念与美国决策者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判断、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的设计，乃至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建构等多方面问题密切相关。依据不同侧重点，冷战史学者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地缘战略、国家建构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展开了全面讨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研究进一步综合，但不同流派之间的壁垒尤在，未能对外交、防务、国家利益等要素之间的关联加以分析，因此缺乏基于多维度视角理解美国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的整合性研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② 自投身冷战史研究之初，便致力于在冷战史不同流派之间搭建桥梁，进一步推动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本文试图以莱弗勒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为切入点，探析莱弗勒对冷战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他的局限所在。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概念界定与冷战史 主要研究流派介绍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对“国家安全”一词做出

-
- ① 战后美国外交史与冷战史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高度重叠，冷战史研究的三大流派均脱胎于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冷战史研究发生“国际转向”，战后美国外交史与冷战史的区别才开始显现。本文对梅尔文·莱弗勒国家安全观研究的讨论与三大流派直接相关，为精简行文，下文统一用“冷战史”概括表达，不再并列使用“战后美国外交史”。
- ② 梅尔文·莱弗勒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任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专注于冷战史、美国外交史研究，在美国战略决策与国家安全等领域著述丰富、影响深远。1993年，其著作《权力优势》同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的罗伯特·H. 费雷尔图书奖（Robert H. Ferrell Book Prize）以及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协会的胡佛图书奖（Herbert Hoover Book Award）。2008年，《人心之争》一书获得乔治·路易斯·比尔奖（George Louis Beer Prize）。2010年，他与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合编并出版了三卷本《剑桥冷战史》。莱弗勒曾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在学术界和教育领域承担多项要职，还曾在美国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委员会中就档案解密工作提供咨询建议。近年来，他持续出版与编辑学术作品，继续关注冷战遗产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定义,指出国家安全的要旨是保卫国家自身的核心利益,使其免遭外部威胁的侵扰。^① 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学术研究历程与冷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扩张亦是诸多国家安全理论的源头性案例,故而冷战史学者在借鉴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家安全”定义时,其研究对象特指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② 具体而言,冷战史学者首先会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随后判断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威胁来自何方,最后在布赞的定义的基础上分析美国的核心利益与“外部威胁”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此揭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与运作逻辑。由此,在冷战史学发展历程中,围绕对冷战起源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观的不同理解,诞生了三个冷战史研究主要流派,它们通常被称为传统派(traditional)、修正主义(revisionism)和后修正主义(post-revisionism)。^③ 基于此种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三个流派大致又可归为如下两类。

文安立将传统派与后修正主义者以及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合称为现实主义者(realists)。^④ 现实主义者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界定主要基于“安全利益”,其研究重心通常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观念与外交、防务政策。在威胁来源的问题上,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因此偏好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与汉斯·J.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从20世纪40年代便开始讨论国际地缘环境的变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特别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欧亚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状态之间的关联。^⑤

① 参见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3, p. 5。

② 参见牛可:《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78~97页。

③ 参见 Charles E. Neu, *The Changing Interpretive Struc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John Braeman, Robert H. Bremner and David Brody, e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7; [美] 弗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牛可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7~138页。

④ 参见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1。

⑤ 参见 George F. Kennan,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 *Foreign Affairs*, Vol. 29(3), 1951, pp. 351-370; Hans J. Morgenthau,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s. Moral Abstrac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4(4), 1950, pp. 833-854。

后修正主义的奠基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继承了传统派的研究路径，重点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早期苏联力量增长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如何形塑了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① 现实主义者的研究通常将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作为研究的起点，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视为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的反应，并在这种分析逻辑中强化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防御”特征。不过，这种解释显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断加速的海外扩张情况不相符，亦无法解释美国的“安全利益”为何如此广泛，是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引发了修正主义学者的广泛批评。

修正主义者主要受进步主义史观影响，更加强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奠基人，他将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扩张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革命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认为避免停滞和衰退、保障经济繁荣是美国一系列海外扩张的根源动力，称这套扩张模式为“门户开放帝国主义”。^② 合作主义学派是进步主义的一个分支，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了进步主义者从内政出发的视角，关注政治经济结构、立法部门、意识形态，以及领导人决策风格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之间的关联。^③ 进步主义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远远超出了“安全利益”的范畴，而扩展到更为宏观的经济利益层面。此外，相较讨论“外部威胁”，进步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的延续，旨在防止衰退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动因才是其对外扩张的逻辑源头。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调和性的叙事逐渐成为学术潮流。进步主义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已经开始讨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扩张性。^④ 后修正主义史学家丹尼尔·H. 耶尔金（Daniel H. Yergin）则与合作主义学派的迈克尔·J. 霍根（Michael J. Hogan）类似，关注冷战与美国内政之

①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参见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③ 参见 Michael J.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参见 [美] 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 年版。

间的关联。在研究观点上,双方的融合更加频繁。在经历进步主义的冲击后,几乎所有后修正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存在扩张倾向,美国政府过高估计了苏联力量的增长,采取了一系列加剧地区紧张态势的外交政策。^①

不过,上述融合仍然有限。现实主义者虽然认识到国家利益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判定,但是他们仍倾向于将利益定义为狭义的经济利益,强调经济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例如,加迪斯在批判修正主义“经济决定论”时,指出经济涉及的贸易和投资是商业团体的事务,政府只应提供信息和帮助,但如果政府告诉商人向哪里投资、与谁进行贸易,则会招致极度的反感。^②即便政治、经济等要素都对国家安全观念的变迁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研究者也总会选择自己认为更加重要的对象作为讨论的核心。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看,现实主义者偏重外因说、进步主义者偏重内因说的分野依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上述两个流派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性特征认识不够充分。现实主义者更是认为,由于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客观存在,故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对“外部威胁”的回应。^③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看法受到文化史研究取径的挑战。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国家的边界不仅仅由地理因素确定,也由大量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为此,在理解国际关系时,除了要把握国家间权力层面的互动,还要把握文化的交流,以及权力层面的互动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④这便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究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状态,还是美国决策者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

莱弗勒在展开研究时,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转

① 参见 Daniel H.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3), 1983, pp. 171-190。

② 参见[美]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2页;Bruce Robellet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82-185。

③ 参见 Arthur Schlesinger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46(1), 1967, pp.23, 25-26。

④ 参见[美]入江昭:《权力与文化》,吴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i页。

移到对美国国家安全观上来。如果说美国国家安全强调的是诸如地缘政治部署、国家生存环境与国家利益所在等相对客观的情况,那么莱弗勒对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强调的则是美国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经由感知形成的对上述客观因素的理解与抉择才是塑造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逻辑基础。^①同时,莱弗勒借鉴了布赞等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将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战略的解释框架,用以理解外交、经济与防务之间的关联。^②他尤其希望明确,美国决策者如何界定自身的核心利益,如何判断外部环境中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观的运作逻辑与核心特征是什么。下文将从这三个核心问题出发,依序讨论莱弗勒研究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方法。

二、全球防务:莱弗勒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界定

在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时,现实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都碰到了各自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实主义者侧重“安全利益”的解释模式无法回应美国海外扩张的现实,而进步主义者强调“经济利益”驱动的逻辑又忽略了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实际影响。莱弗勒界定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便是要明确“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尤其是要判断这种关联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及范围的设定。

莱弗勒对美国“经济利益”的理解与其个人学术经历密切相关。在他求学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校园内反战情绪高涨,游行示威活动频繁。莱弗勒此期就读于素有进步主义传统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在这里深入学习了威廉斯与拉费伯尔的作品,结合美国国内政治的实际情况,莱弗勒愈发相信进步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相信资本主义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与美国的战略扩张之间的确存在直接因果关联。进入20世纪70年代,当莱弗勒投身冷战史研究之时,他深受修正主义研究取径的影响,赞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和劳埃德·加德纳(Lloyd Gardner)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观点。他们都认为,在经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

①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in Frank Costigliola and Michael J. Hoga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3。

②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7(1), 1990, p. 144。

外交决策者确信，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美国经济就无法从萧条中复苏，为此，美国决策者才会希望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塑造世界秩序，这一观念也直接影响了战后美国对德、日的政策。^①

受进步主义的影响，莱弗勒尤其关注经济因素对美国地缘战略的影响。经济并非狭义上的商业利益，而是更加贴近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在阐述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时提及的“国内生产”，以及地缘政治理论强调的物质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战（total war）的经验深刻塑造了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亦使福里斯特尔认识到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前线军事力量，而且依赖后方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获取资源、供应前线的能力。支撑美国持续进行战争的是其国内生产能力，因此资源始终是莱弗勒理解地缘战略乃至国家安全的关键词。在莱弗勒看来，地缘政治实际是在解释“国家为了追求权力政治如何动员能力以及取得更多资源，并将这些资源与新形式的运输手段和武器结合起来”。^②只有在资源被充分获取、充分利用时，国家权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才可能实现。^③倘若无法充分获得这些资源，则既无法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也难以有效实现战时动员，这将大大制约美国的战略能力。^④

莱弗勒进一步指出，地缘政治安全对资源的依赖，说明国家安全并非仅仅意味着保卫国土。^⑤他试图打破传统研究中国家利益与地缘安全之间的壁垒，指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既无法也不必做出分割。防务部门对安全的考察始终与获取资源的途径息息相关，他们认为“决不能再允许潜在对

①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Safeguarding Democratic Capitalism: U.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1920-20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4-8, 14。

② [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p. 31, 47; [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页。

④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2), 1984, pp. 357-359。

⑤ 参见 [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页。

手通过自给自足的经济实践、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地区的资源。因为获取这些资源可以让潜在敌人提升其军事能力，鼓励他们对西半球进行渗透，诱惑他们向美国发起进攻，并且还可以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持久战”。^① 在考察国务院、防务部门诸多重臣的过往经历时，莱弗勒认为他们的银行家、律师、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等身份背景强化了如下认知：“在经济和战略目标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没有必要，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对资源的控制或者获取来界定权力的，而美国的官员们通常同时追求经济和战略目标。”^②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哪一项具体的国家利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就都已遍布全球。莱弗勒指出，尽管杜鲁门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者乔治·凯南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五个“军事—工业”中心才是防务政策的重点，但在实际运作中，巩固这些堡垒的关键同样在于有效调度周边可以使用的资源。这就导致凯南的国家安全战略涵盖了五个中心之外的大片地区，包括东地中海、北非、西太平洋，以及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所。^③ 更何况，欧亚大陆仅仅是美国防务的一个组成环节。由于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除了欧亚大陆，大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理论同样要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从1943年开始，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认为美国必须拥有一个由外围基地组成的防御环线。在太平洋，这个环线要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冲绳和日本以前的托管地；在大西洋及其周边，则要包括西非地区以及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此外，门罗主义依然必不可少，以武力防卫巴拿马运河也具有战略必要性。^④ 相较其他现实主义者，莱弗勒更加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部署的全球性，指出欧亚大陆的平衡、两大洋的霸权、门罗主义的延续、空中运输权的保障，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①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0页。

②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页。

③ 参见[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03~304页。

④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2), 1984, pp. 350, 353–354。

在莱弗勒的分析模式中，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并非两个相距甚远的概念，以资源为核心纽带，莱弗勒证明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仅限于领土安全，资源与防务的关系决定了获取海外资源、保障交通稳定、维护全球市场繁荣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有鉴于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逻辑始终是全球性的，这也是为何莱弗勒会强调，自1943年起，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唯一的变化就在于干涉程度逐渐加深。^①

三、事实与感知：莱弗勒对美国威胁感知的分析

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判断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现实主义者会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安全的角度出发，论证苏联在东欧与中东的行动破坏了欧亚大陆的均势，以此证明国际环境中的“苏联威胁”是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布鲁斯·罗贝莱·卡尼霍姆（Bruce Robellet Kuniholm）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苏联对中东资源、领土的诉求以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倾向，是希腊、伊朗、土耳其危机的直接原因。^②相对而言，进步主义者更侧重国内政治结构、经济利益与制度安排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美国外交决策者对威胁的感知往往源于对经济衰退的忧虑，而非仅由“外部威胁”决定。在借鉴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莱弗勒并未简单否定某一流派，而是尝试将进步主义对威胁感知的国内经济根源分析与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强调整合为一个互动性的分析框架，从而强调决策者的感知如何在结构性的条件下构建与修正，并最终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

在莱弗勒看来，现实主义者对“苏联威胁”的讨论混淆了事实与感知之

① 参见[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75、381~382、398页。

② 参见 Bruce Robellet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29-431;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36, 151-171, 201-203;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2~45页。

间的界限。^①现实主义者将外部世界中的客观现实转化为价值判断，却没有分析判断形成的缘由，这种叙述逻辑还在由果及因的逻辑链条中倒推“苏联威胁”的成因，强化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苏联行为之间的绝对关联。莱弗勒指出，倘若从事实的角度分析，在近东危机至杜鲁门主义出台期间，苏联对土耳其几乎没有继续施加什么压力，苏联的军事实力也并不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不仅如此，连苏联有能力占领西欧这个假设都有待商榷。^②苏联在东欧的一系列军事活动是客观现实，而将这些行动界定为“苏联威胁”却是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感知，是经由主观判断得出的政策结论。

不过，既然莱弗勒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关联，那么美国外交决策者感知的威胁究竟来自何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家力量的对比中处于优势地位，又为何会产生强烈的“脆弱感”？在援引此期的外交材料时，莱弗勒认为并非一个有“敌意”的欧亚大陆才是危险的，相反，美国要“避免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落入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联盟手中”。这就意味着，一个中立的欧亚大陆同样存在危险，欧亚大陆地缘均势并不足以保障美国的关键利益。只有在这些地区建立力量优势，才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③同样地，莱弗勒在对美国防务部门的分析中指出，无论战时联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海外军事基地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都至关重要。这种考虑同样基于一种广泛的不安全感，认为此地的威胁来源于任何潜在的敌人，因此需要建立优势，甚至需要拥有排他性的力量。^④实际上，正是由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逻辑判定其核心利益遍布全球，才导致其外交与防务部门认为世界各地的风险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直接相关，这就是美国决策者感到自身“脆弱”且“易受攻击”

①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in Frank Costigliola and Michael J. Hoga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

②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Repl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2), 1984, pp. 395–396。

③ 参见[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页。

④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2), 1984, pp. 349–352。

的直接原因。

莱弗勒表示，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的脑海中，外部世界的风险不完全与苏联相关，欧洲民生凋敝的状况、英法殖民力量的衰退、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以及左翼思想的浪潮，任何未来世界中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被定义为风险与威胁。^① 因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世界格局出现变化，从而影响美国有效获取这些地区资源的能力，并将最终给美国国内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海外市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外部世界威胁的判断与苏联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即便苏联什么也不做，美国依然会要求建立两大洋的霸权地位与欧亚大陆的优势力量，而任何影响美国建立优势力量的因素都会被判定为威胁。对威胁的感知总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可随着美国国家利益边界的不断拓展，其威胁感知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这就导致美国国家安全的需求节节攀升。

四、零和博弈：莱弗勒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征的分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特征直接影响美国决策者处理国家核心利益与威胁感知关系的组织原则，美国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他们对核心利益的界定交织在一起，最终转化为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外交决策者需要处理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广泛的核心利益、如此之多的外部风险，如何对它们进行排序。而排序的方法便凸显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特征。

无论是作为现实主义者还是作为进步主义者，冷战史学家都不曾否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呈现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特征。只不过，对这种特征的形成过程，研究观点存在分歧。进步主义者通常认为，美苏对抗的零和博弈特征与美国的扩张传统相关。^② 现实主义者则认为，美国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变化中慢慢滑向零和博弈状态的。现实主义者强调，从美国的安全利益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之关联的角度看，美国地缘安全政策首先以恢复

① 参见[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45~646页。

② 参见[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2~33页。

欧亚大陆的均势为核心，并制定了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的“有限遏制”政策。然而，美国外交决策者在反共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混淆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美国战略目标的无限扩充，最终形成了全球反苏反共的“全面遏制”政策。^① 莱弗勒重新分析了进步主义内因与现实主义外因解释模式之间的关联，将美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评估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综合为一个整体，用以解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零和博弈特征的形成原因。

首先，在重新判断美国的核心利益后，莱弗勒延续了进步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恢复欧亚大陆的均势，相反，其始终在追求权力优势（preponderance of power），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优势。尽管欧洲事务的确是美国战略的重心，但它同样需要嵌套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中，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目标。而防务部门的基本考虑是，无论战时联盟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海外军事基地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都至关重要。这就说明美国的战略目标起初并非针对苏联，而是建立在美国拥有全球力量优势的假设之上，旨在防范任何潜在的敌人，这在无形中拓展了美国战略的边界。安全需求的节节攀升又导致威胁感知水平的上升，随即扩大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防务义务，致使世界各地的混乱都可能成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②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开始认为遵守《雅尔塔协定》中的一系列条款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因此希望采取试探性的步骤放弃或重新解释一些关键条款。^③ 莱弗勒借此综合了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各自的研究重点，指出追求地缘政治中力量对比的优势是美国海外扩张的动力源头。

其次，判断是否具备优势必须先确定比较对象，而此期唯一可能与美国力量形成对比的便是苏联，这才是苏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主要原因。^④

① 参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2), 1984, pp. 349-352, 363.

③ 参见Melvyn P. Leffler, *Adherence to Agreements: Yalta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ar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1), 1986, pp. 88-123.

④ 参见[美]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页。

更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力量优势的过程可能充满不确定性。莱弗勒指出，如果美国能够打破英镑壁垒，能够将重点工业国家控制在其影响力范围内，能够笼络新兴的独立民族国家，那么美国就将获得未来发展的优势力量。但是，这些机会并不仅仅面向美国存在，苏联同样可能利用这些机会，以此增强自身的实力。正因如此，莱弗勒才会认为，威胁并不是源于苏联行为本身，而是源于一系列不确定的可能性：“假如苏联能够夺取或者笼络更加先进国家的工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熟练工人，那么它将成为美国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可能会利用一些并非他们主动制造的事件，而这种利用可能有助于扩大他们长远的优势。”^①

最后，莱弗勒指出反共的偏执意识形态发挥了桥梁般的作用，促使美国的决策者从上述风险中识别出更具威胁性的特征，并为不同的风险建立关联。^②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尤其是反共的意识形态发挥的都是“简化”外交决策程序的作用，为千头万绪的外交工作提供了一致的路径，“向共产主义发起一场全球性的斗争既容易让美国人理解又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③在这种语境之下，反共的意识形态不光是美国外交决策者观察世界的透镜，更具有实用性目的，用以服务于扩张性的战略目标，促使决策圈达成“冷战共识”，并成为引导美国国内舆论风气的工具。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并不是在反苏与反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考虑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与苏联可凭借的机会之间的关联。这些机会看起来稍纵即逝，如果美国没有优先获得这些机会，那么它们就很可能被苏联攫取。即使战争永远都不会爆发，美国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慌也会长期存在。^④正因如此，莱弗勒发现，美国的官员们不仅希望瓦解苏联的阵营，而且几乎在各地都要采取反共政策。^⑤

①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7 页。

②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 60。

③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41 页。

④ 参见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30、645 页；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 50。

⑤ 参见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384、390~391、394~396 页。

总的来说,莱弗勒并未将零和博弈视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非理性因素,相反,美国决策者正是因为觉得与苏联合作的成本太高,并且远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才会选择单边主义的路径。追求权力优势而非均势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零和博弈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性同源,同样是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意识形态偏好“简化”了外交决策的过程,在美国国内舆论中为全球扩张的战略提供了合理性说辞,催化了对失去海外资源控制能力的恐惧,从而导致外交战略中的缓和变得尤其困难。

五、莱弗勒的学术贡献与局限

20世纪80年代,莱弗勒对国家安全的研究集中在资源与防务的关系上,通过分析利用海外资源与大纵深防御、保障欧亚大陆优势力量之间的关联,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球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莱弗勒扩大了他的研究范围,将资源与防务的关系扩展到经济与政治的关联,由此论证了海外市场繁荣、世界和平对美国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进入21世纪,在吸收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研究取径的基础上,莱弗勒明确了分析美国国家安全观的三个基础支点——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指出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最终影响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并开始探索将“国家安全”作为研究取径(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的可行性。^①

莱弗勒以联系的、动态的视角看待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进程,指出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等要素不会孤立地发生作用,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貌相互组合、交互影响,决定着该时期国家战略的核心命题。这种对美国国家安全整体性的强调,弥合了美国建国以来的两种互相冲突的外交实践原则,指出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亦为总体冷战(total cold war)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肯尼思·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在莱弗勒的研究基础上,结合

^①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Bringing it Together: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 43–63。

两次世界大战总体战的特征，指出冷战的性质与之类似，实为总体冷战。^①美、苏在和平时期展开全面对抗的基础是两个超级大国甚至是两大阵营内部的综合生产力。政治手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凝聚力、科学技术进步等要素都与提高生产力、赢得冷战胜利密不可分。当这些要素被裹挟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之时，它们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都被赋予了政治性的意涵。

莱弗勒对冷战全球性的强调也丰富了对冷战威胁来源的解释，这种分析模式因此能够容纳更多的参与者。莱弗勒勾勒出一幅前途未明的国际局势图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民族国家走向独立，这些新兴的、独立或即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冷战的博弈中尚未被纳入任何阵营，这就意味着美国 and 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变动的，未来的世界格局包含极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两大阵营在遏制对手的力量之外，都围绕着国家建构的主题争取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加入己方阵营。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反复调整与这些国家的距离，处理民族独立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争取让这些国家加入己方阵营，从而在不稳定的地缘环境中扩大自身的长远优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冷战演变成一场“人心之争”。^②

尽管如此，对莱弗勒将美国国家安全上升为一种研究取径的做法，有两点需要警惕。第一，莱弗勒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定义存在较大弹性，因此也具有较大模糊性，它不仅指代“捍卫国家的组织意识形态，如自由资本主义，保护国家政治制度，以及维护国家的物质基础或领土完整”，^③而且扩展到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追求。^④概念扩张使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界限不清，研究者难以就何为真正的核心利益达成共识，研究的聚焦性与可操作性也将随之削弱。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充的核心利益会导致重点利益与边缘

① 参见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② 参见 [美]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7页；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25-26。

③ Melvyn P.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7(1), 1990, p. 145.

④ 参见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26页。

利益的界限不断变得模糊，如此这个概念便会退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成为进步主义先驱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所言的“在外交事务领域，当政客和利益团体想要完成任何特定计划时使用的说明公式”。^①因此，莱弗勒即便继承了进步主义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烈批判精神，也仍然无法在接受美国核心利益扩充的同时有效批判美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张状态。

第二，莱弗勒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明显的“美国中心”取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分析结构无法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取径，因而更适合用于个案分析，或者为更长时段的美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在国际关系史中，美国的霸权塑造过程具有高度特殊性，而冷战时期不同类型国家面临的战略选择与国内政治基础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英国、法国等传统帝国受到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帝国解体与国内党派政治的影响，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已经从维系全球殖民统治切换至欧洲防务问题。新兴独立民族国家更多受到稳定国内政局与国家建设需求的影响，在外交上追求与尊重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相匹配的国际环境。因此，应当将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观视为具有特定情境的分析范畴，避免以偏概全、陷入研究泛化陷阱，还应尝试以多元力量互动的视角看待美国力量的消长，摆脱美国中心主义叙事的束缚。

（责任编辑：李润东）

^① Charles A. Beard, *The Open Door at Home: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4, pp. v-vi.